

《迹象与生命》所载中国药用植物考*

□ 时 光

摘 要:《迹象与生命》(*Āthār va Ahyā*)为伊朗伊儿汗王朝宰相拉施特编著的一部波斯文农学与植物学著作。该书“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收录了数十种原产自中国的木本、草本植物,并详细介绍了这些植物的名称、分布、性状、栽种及功效。本文通过研读与翻译相关文本,结合中外古今史料,重点研究了书中所载的中国药用植物,分析当时中国药用植物西传伊朗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迹象与生命》 中国 伊朗 药用植物

一、波斯文古籍《迹象与生命》简介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伊朗地区,建立了伊儿汗王朝(1256—1335),统治阶层为发展统治区内的经济,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在这一背景之下,伊儿汗王朝著名宰相拉施特^①(1247?—1318)于14世纪初编订了一部农学及植物学著作——《迹象与生命》^②(*Āthār va Ahyā*^③)。该书书名的另一种说法为《迹象与见闻》(*Āthār va Akhbār*),认为因波斯文写法近似,“见闻(Akbār)”一词被误写为“生命(Ahyā)”。但拉施特在其另一部著作《拉施特镇捐赠书》(*Vaqfnāmah-i Rab'-i Rashīdī*)中也曾提到此书,书名亦为《迹象与生命》(*Āthār va Ahyā*)。^④

《迹象与生命》现存三个抄本:

抄本一现收藏于伊朗库姆市大阿亚图拉沙哈布丁·纳杰菲·马尔阿什(Āyatullāh al-'uzmā Shahāb ud-Dīn Najafī Mar'ashī)图书馆,纳斯塔利格体(Nasta'liq)书写,共102叶,无成书日期。

1989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与伊朗德黑兰大学(University of Tehran)合作出版了由曼努切赫尔·苏图代(Manūchihr Sutūdah)与伊拉季·阿夫沙尔(Īrāj Afshār)两位伊朗学者共同校注修订的排印本,本文所引用的《迹象与生命》文本内容均来自此排印本。

抄本二曾为阿卜杜加法尔·纳季穆杜莱(Abdul-Ghaffār Najm ud-Daulah,生卒年不详)私人收藏,未注明成书日期,于1944年发行了石印版,与其他作品合编为《合赞汗时代学者、行政长官与旅行者论农业》(*Falāhat va Zarā'at, Talīf-i Ālim va Āmil va Sayyāhī dar Ahd-i Ghāzānkhān*)一书,目前此抄本已经佚失,去向不明。

抄本三现收藏于伊朗国家档案文献图书馆,纳斯赫(Naskh)字体书写,末尾页成书日期有被水涂抹痕迹,但可辨认出应为“伊斯兰教历1296年赖比尔·阿色尼月(公历1879年4月)末”^⑤。

*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伊朗医学交流史研究”(项目号:2018VJX101)阶段性成果。

① 拉施特,全名刺失都丁·法兹卢拉·哈马丹尼(Rashīd ud-Dīn Faẓlullāh Hamidānī)。

② 在王一丹撰写的《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中指出该书有另一中译名“《迹象与复苏》”。

③ 本文涉及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采用MESA转写系统,其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冠词词汇按照太阴、太阳字母读音规则转写。

④ Rashīd ud-Dīn Faẓ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Tehran: University of Tehran Press, 1989, pp. bīst-u-du—bīst-u-hasht.

⑤ Rashīd ud-Dīn Faẓ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 bīst-u-hasht.

从上述几个抄本内容中均无法判断出拉施特完成该书的年代，但拉施特在其主持编译的另一部关于古代中国医学的著作《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Tanksūqnāmah-i Īl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ṭāyī*，以下简称“《珍宝书》”)中曾经写道：

当今根据陛下的圣旨开始对他们^①的一些书籍、历史与作品进行翻译，根据其记录，努力获得他们的书籍，培养懂得他们语言与了解他们的人，翻译了……麻醉药、矿产、树木、兽类、鱼类、官职类等方面的著作……^②

拉施特所编译的汉文经典著作均完成于他本人出资兴建的“拉施特镇(Rab'-i Rashīdī)”内，该镇于14世纪初修建完毕，《珍宝书》现存唯一的抄本完成于1313年，而拉施特另一宏大历史巨著《史集》(*Jāmi' al-Tavārikh*)则完成于1311年，属于上文所提及的“历史”著作，《迹象与生命》显然应为关于中国“树木”的著作，由此可以推断《迹象与生命》成书时间应介于14世纪初至1313年之间。

《迹象与生命》全书应有二十四章，但前述三个抄本均未能保留该书全部内容，曼努切赫尔·苏图代与伊拉季·阿夫沙尔1989年排印本将抄本整理成六章出版，六章标题分别为：第一章：介绍树木性状；第二章：印度与中国树木；第三章：嫁接与施肥；第四章：大麦、小麦、黍米、水稻与高粱性状；第五章：其他各类谷物、植物性状；第六章：绿蔬与香草性状。^③

《迹象与生命》排印本“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共介绍了25种产自印度与中国的木本、

草本植物，其中明确指出在秦(Chīn)^④、乞台(Khatāy)^⑤与蛮子(Mānzi)^⑥等中国境内生长与分布，或转写了其汉语名称的植物为：阿勃勒树^⑦、肉桂树、胡椒(hūrsiu)树、石竹(nīk tīk)^⑧树、槟榔(f.nām)树、葵叶树、茶(chā)树、芒果树、檀香(tālī h.ng)树、红栳(k.nk ji.n)树、松木(sūnk m.q)树、沉香(ch.m jink)树、苏木(sū mūq)树、荔枝(lījiu)树、灵眼(līkyān)树、dānīkū树、莲花(l.nīk khvā)、鸡头花(kītū khvāh)、杨梅(yāng mī)树、pāp.d.z.h树、z.h tiurāng草。^⑨

中国学者对《迹象与生命》及其中所记载的中国植物的研究不多，已正式出版的学术成果中，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编著的《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中对《迹象与生命》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介绍，研究了书中记录的“茶”与“莲花”相关内容，并指出“由于抄录过程中的字母脱落和讹误，目前仍有几种植物的名称难以确定，有待更深入的研究”^⑩。此处提到的汉语名称未确定的中国植物为nīk tīk树、dānīkū树、pāp.d.z.h树及z.h tiurāng草等。

二、《迹象与生命》所载中国药用植物 文本译注

在《迹象与生命》“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提到了肉桂、胡椒、荔枝、灵眼、莲花、鸡头花六种中国植物的药用价值，本文将其中部分段落由波斯文译成汉语，并参考与上述药用植物相关的中国、伊朗古代农学及医学书籍，进行文本释文分析。

① 指中国人。

②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Tanksūqnāmah*. Tehran: 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5.

③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panj—dah.

④ 伊儿汗王朝时期一般泛指中国，有时也特指中国北方地区。

⑤ 伊儿汗王朝时期一般指金朝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

⑥ 伊儿汗王朝时期一般指南宋王朝控制的中国南方地区。

⑦ 一种甜瓜，形似黄瓜，又称腊肠树、波斯皂荚、牛角树等。

⑧ 排印本中该植物波斯文名称为“قرنفل(qaranful)”，意为“石竹”或“康乃馨”，但暂未考证出其对应汉文名称。

⑨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haft—hasht.

⑩ 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1. 肉桂^①肉桂^② 树性状介绍

在汉语中被称为“桂皮”^③。树干高大，树枝繁茂，当完全成年后，其树冠如此巨大需五人方可合抱之，高度可及大型梧桐与肉豆蔻，叶近似“白树(sifid dirakht)”^④，呈圆形，但双面皆绿且宽大。

【分布】于秦、赣州^⑤、新州^⑥及其所属地区。

……

另有一种被称为“吉尔法(qirfah)”^⑦，分布于印度与秦部分地区。但秦的“吉尔法”更好。“吉尔法”的质地松软，肉桂的质地坚硬。正如此处所见。

……

由于中国人不购买外国商品，因此中国的肉桂也很少传入本地^⑧。

印度的肉桂被称为“吉尔法”^⑨。产自秦的肉桂被称为“特殊的肉桂”^⑩，用于制作底野迦(tiriyāq)^⑪，之前较少传入，当今已经增多。

2. 胡椒^⑫

胡椒树性状介绍

黑胡椒树在印度语言中被称为“尼勒(nil)”，在蛮子与乞台语中被称为胡椒(hürsiu)。……

在我国^⑬，医师们会寻求用白胡椒制作各类底野迦及其他几种马准^⑭，且很少能够找到，在秦有【白胡椒】，但需求量不大，由于极度辛热，无人问津。【白胡椒】很少作为商品输往他处，因为有了黑胡椒，便无人再购买【白胡椒】了。

当黑胡椒运至我国后，【人们】会以白胡椒两倍价格购买。

①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ḡyā*, pp. 77—79.

②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دارچینی (dārchīnī)”或“دارچینی (dārchīnī)”，“دار (dār)”是阿拉伯语“树”或“木头”之意，“چینی (chīnī)”或“چینی (chīnī)”为波斯语“中国的”之意，因此该词原意为“中国树”，之后特指肉桂树。肉桂有不同种类，本节中出现的“肉桂”或特指“中国肉桂”(详见本篇下注)。

③ 《迹象与生命》的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کوی سیی (kui siy)”，但其中的字母“س”在手抄本中可能为“ص”，该字母(或特殊符号)在伊儿汗王朝时期经常被用来转写汉语中的辅音“p”，因此“کوی سیی (kui siy)”应为汉语“桂皮”一词的转写。桂皮与肉桂实为两种不同的植物，根据下文记载的植物性状、在伊朗地区“用于制作底野迦”等内容，本节介绍的植物应为“肉桂”，而非“桂皮”。《珍宝书》中介绍“五苓散”时，也曾将其中的肉桂(官桂)记为“桂皮”：“其二为由于消化不良伤风而出现上吐下泻，且伴有发热，其治疗方法为服用名为‘五苓散’的药水，其配方为茯苓—梅斯加勒、猪苓—梅斯加勒、白术—梅斯加勒、泽泻—迪拉姆、桂皮—迪拉姆，将此五种药材捣碎烧煮后滤出放凉，将药水给病人服用可痊愈……”(Tanksūqnāmah, p. 458.)

④ 暂未考证出此树的汉文译名，或为白杨(سپیدار [sipīdār])。

⑤ 或指元朝时期赣州(路)，当时隶属于江西行省。

⑥ 或指元朝时期新州(路)，当时隶属于江西行省。

⑦ 波斯文写作“قرفه(qirfah)”，原意为“树皮”，可指肉桂树。肉桂有不同品种，如中国肉桂与印度肉桂等，印度肉桂酥脆，中国肉桂厚硬。根据下文提到“‘吉尔法’的质地松软，肉桂的质地坚硬”，可推测“吉尔法”或为印度肉桂，而“肉桂”或特指中国肉桂。

⑧ 指伊朗地区。

⑨ 即印度肉桂，详见本篇前注。

⑩ 即中国肉桂，详见本篇前注。

⑪ 又名“底也伽”，一种主要成分为鸦片的解毒剂，除鸦片外，还有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胡椒等成分，中国最早关于“底野迦”的记录出现在唐代，659年编纂的《新修本草》中记载：“底野伽，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旧唐书》中记载：“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献底也伽。”底野迦在伊本·西那(Ibn-Sīna, 980—1037)的《医典》中多有记录，在《回回药方》中被记为“荅儿牙吉”。

⑫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ḡyā*, pp. 80—81.

⑬ 指伊朗伊儿汗王朝。

⑭ 即舐剂，《回回药方》中记为“马竹尼”。此处“معاجين (ma‘ājīn)”为“马准”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为“معجون (ma‘jūn)”。

然而在这些地区^①只要有优果，则无人对劣果感兴趣，因为会从他处引进优质果实，并按同样的价格购买。

若将此劣果商品输往他国，无人会购买，因此肯定无人从事贩运，在该地区白胡椒亦是如此，所以当我国有需求时，难以获得。^②须知制作底野迦与其他几种马准时需要购买【胡椒】。^③

3. 荔枝^④

荔枝^⑤性状介绍

分布于蛮子地区的福建与刺桐^⑥城，其他地方无。其树大小如橡树，枝多。其树干与树皮类似橡树，叶如毛桃叶，长且大，带有小刺，但稍扁，其花均为黄色，大小如李子花，但气味不佳。

当其果实尚小时为绿色，成熟后或绿或红，鸡蛋大小，因此【成果时间】漫长，与

毛桃比较，气味更香溢、更甜美，其表皮结实如鱼鳞。

但剥开表皮后，其里色白柔软，果核光滑呈黑色，大小如一指节，极度坚硬。其果可风干，作为商品运至各地，类似杏干。^⑦当风干之后内为红色，外为黑色。风干状态下口味气味俱佳，甜美无比。^⑧

欲栽种时，可使用其周身的幼树栽苗，如有需要也可培育其种子，当然亦可使用嫁接。

类似苹果、榲桲^⑨，可将其置于蜜糖之中制成果酱。^⑩【荔枝】具有偏热属性，其功效为消除腹泻。^⑪

在该地区此水果【生于】高山、丛林及园林。

4. 灵眼（银杏）^⑫

灵眼^⑬树性状介绍

灵眼树分布于蛮子境内被称作“Būk.sān

① 指中国与印度地区。

② 在《马可波罗行纪》“刺桐城”一章中曾提到，元朝对刺桐港出口货物征收重税，“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或许是中国胡椒经伊朗等西亚地区运往欧洲数量稀少的另一原因。

③ 白胡椒主治积痰、腹痛、反胃、泄泻、冷痢，且有促呕吐功效，在《医典》与《回回药方》中多有记录，如《回回药方·卷之十二·古阿里失突论只方》中记载：“古阿里失突论只方能消散风，克化饮食并香口气。橙子皮（干者）三两，丁香、肉豆蔻、荜拔、胡椒、缩沙、肉桂、良姜、干姜各一钱，麝香（西番者）一点五分。”在古代伊朗，人们会让过量食用鸦片者就医前服用熬制过的白胡椒汤，促其呕吐。

④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90—91.

⑤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لیجیو (lījīu)”，即“荔枝”，在中国历史上又曾被写为“荔支”。东汉杨孚编著的《异物志》中便对荔枝的记载：“荔支为异：多汁，味甘绝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生时，大如鸡子，其肤光泽。”

⑥ 即泉州。

⑦ 元代农学家王祯所著的《农书》中有关于大量商贩因荔枝干深受欢迎，将其输往中国境内外各地的记载，其中海外目的地包括大食地区：“今闽中荔枝，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陆转，贩鬻南北；外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

⑧ 王祯《农书》中有“晒荔法”的记载：“采下即用竹篱日良晒；经数日，色变核干，用火焙之，以核十分干硬为度。收藏用竹笼；箬叶裹之，可以致远。成朵晒干者，名为荔锦。”

⑨ 又名木梨。

⑩ 王祯《农书》中亦有用蜂蜜制作荔枝果酱的记载：“取其肉，生以蜜熬作煎，嚼之如糖霜然，名为荔煎。”

⑪ 中医学认为荔枝味甘、酸，性温，入心、脾、肝经；可止呃逆，止腹泻，是顽固性呃逆及五更泻者的食疗佳品，但因性热，多食易上火。

⑫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96—97.

⑬ 在《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لیکیان (līkyān)”，据此写法暂时无法找到其对音汉字，推测该词第一次出现的字母“ی”有可能为字母“ن”的误读，波斯文抄本中实际写法或为“لنکیان (l.nkyān)”，即汉语“灵眼”的波斯文转写。灵眼为银杏果实白果在中国南方的俗称，《迹象与生命》中对该树的描述也基本符合银杏树的特征。元代医学家李杲编撰的《食物本草》中有“银杏又名灵眼”的记载；清代文学家张宗法编撰的《三农记》中叙述银杏树时，也曾提到“北人呼白果，南人名为灵眼”。由于银杏树生长缓慢，从栽种至成果须经过数十年之久，又被称为“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之含义，此外在中国古刹庙宇之中经常可见银杏，也许正因如此银杏树在新波斯语中被称为“درخت کهندار (dirakht-i kuhandār)”，意为“古树”，或“درخت معبد (dirakht-i ma‘bad)”，意为“寺庙树”。

jū”的地区。^①生于果园与丛林，在杭州城及其他城市园圃之中亦可见。^②

该树较梧桐高大，可称大树。树皮树叶近似白杨^③，花色为白，形小繁多，无气味。其果实大小如新鲜带皮肉豆蔻。^④未熟时为绿色，熟后亦为绿色，近似新鲜带皮肉豆蔻。其汁液酸腐，手若触及皮肤即时开裂，人体触及则会引起脓疱，刺破肌肤。^⑤

将成熟后的果实摘下置于井内十五日，每日浇水一二次，至其表皮腐烂脱落后从井中拿出，再置于一木制大漏勺之上并放入竹篮，使汁液从其顶部流净，将苦味表皮完全清理干净。清理之后犹如小肉豆蔻，皮如阿月浑子，剥开后，可见其仁，色绿如阿月浑子，有一内膜类似肉豆蔻内膜。剥开此内膜后，其味如巴达木果仁，较之略甜。^⑥既可煮食，亦可不必煮食而新鲜食用，风干后也可食用。当还未完全成熟时，可作为商品输往各地。获取其果仁汁液，还可熬成汤粥。^⑦

其功效为生食此果可消除因炎热引起的眼痛。^⑧

若欲栽种，应趁其果未破裂时栽种，若已干燥，则依照类似栽种肉豆蔻与阿月浑子的方法种植。

5. 莲花^⑨

莲花^⑩介绍

其自然属性近似荷花(nilūfar)，不属于木本植物，在我国古什塔斯比(Gūshītāsībī)地区^⑪沼泽之中亦有生长。根^⑫为白色，位于水下淤泥之中，粗细如手镯，类似荷花出于水面。如果其高度达到或超过10盖兹^⑬时，便会浮出水面，其叶宽扁如盾，其花较荷花更大，既有白色，亦有青色与红色，其中多为红色。其状甚美，香味扑鼻。

……

当其叶片凋落，其籽新鲜时，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风干后为黑色。其皮坚硬，味

- ① 灵眼(银杏)树分布于中国多地，东北、华南均有生长。在《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的“Būk.sān jū”写作“بوكسان جو”，推测字母“س”有可能为字母“ی”的误读，即应写作“بوکیان جو (Bū kiyān jū)”，或许为汉语“福建州”的波斯语转写，在当时属于“蛮子”地区。《马可波罗行纪》中也曾记载：“从行在国最后之信州发足，则入福州国境”，银杏树在福建各地均有分布。
- ②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另一处中记有一座名为“هیکیسای (Hīnkīsāy)”的城市，也应指杭州，即《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行在城”。杭州城内自古便大量种植银杏树，在当时亦属于“蛮子”境域，毗邻福建地区。
- ③ 今波斯语名为“سپیدار (sipīdār)”。
- ④ 灵眼(银杏)树的果实银杏果确实大如肉豆蔻，成熟前为绿色，成熟后转为白色，因此银杏果又俗称“白果”。
- ⑤ 银杏果(白果)的外皮含有白果酸等酸性物质，能刺激皮肤引起接触性皮炎、发疱等症状，此处的描述是证实“līkyān 树”为银杏树的直接证据之一。
- ⑥ 阿月浑子今俗称开心果，巴达木又称巴旦杏，均为伊朗地区常见的干果，自然成为了拉施特与银杏果比较的对象，此处对银杏果外表、内仁、味道等的表述均十分准确。
- ⑦ 银杏果含有一定毒性，清代陈士铎撰写的《本草新编》中记载：“(白果)多食至千者死……或谓白果小儿最不宜食，有食之口吐清水而死者”，但在《迹象与生命》中对这一重要特性并未提及，或许是由于当时传入伊朗地区的银杏果数量不多或未被当地人普遍食用。
- ⑧ 根据中国古代各医书中对银杏果的记载，白果对心、肺、肾病有治疗功效，可收敛肺气，抑制哮喘等，并无提及可以消除眼疾。《迹象与生命》中出现此记载可能是误闻或误读“灵眼”汉语含义之结果。
- ⑨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98—99.
- ⑩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لینک خوا (Līnk khvā)”，疑为辨读者在阅读抄本时对该词汇中“ی”“ن”字母的写法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应写作“لینک خوا (līnk khvā)”。
- ⑪ 今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
- ⑫ 指莲花的根茎，即莲藕。
- ⑬ “盖兹”为伊朗古代长度单位，1盖兹约为95厘米，10盖兹将近10米，因此该处的叙述疑似有误。

美，被称为“莲子”^①。

【莲花】生于蛮子与乞台，其根可制成粉末，亦可生吃。

需要栽种时，将其根部栽于沼泽地之淤泥之中，其籽新鲜时，将其置于大的淤泥沟壑之中，生于沼泽。^②鄙人曾按此法栽种。

其功效为消暑解热。^③

6. 鸡头^④

鸡头花^⑤介绍

该植物亦非木本，生于水中，其土质亦是如此。^⑥其叶宽大，但有刺，无法手触。^⑦其根肥大，类似甜菜^⑧，且为红色，与被突厥人称作“Dūmln”^⑨之根味道相近，将其制成面粉食用。^⑩其枝亦可生吃，花为青色，大

小如莲花，但气味及形态不及莲花之美。

花朵凋落之后，其籽可见，大小犹如小榛子，呈滚圆状。^⑪初为绿色，成熟风干后色泽转黄，表皮较莲花稍软，其仁为白色，味佳，与初熟之细小巴达木类似，新鲜时与风干后皆可食用。花朵初放之时，表皮柔软，会腐烂受损，无法输往外地。

将泥砖压平，放入水中捣碎，将此果置入砖水之中一二日后洗净，其皮变硬后，便不会腐烂受损得以保存并输往外地。

蛮子与乞台大部分地区沼泽之中见得此植物。若欲栽培，播种便可发芽。^⑫其花可作为玩物，其籽可制成商品。其功效为消暑解热。^⑬

①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لتر (l.l.n.r)”，缺少短元音标音符号，按照汉语中“莲子”的发音，或应写作“لنز (l.lianz)”。

② 此处与北齐农学家贾思勰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种藕法”类似：“春初掘藕根节头，著鱼池泥中种之，当年即有莲花。”

③ 此处应指莲藕的药用价值，与元代医学家忽思慧编订的营养学著作《饮膳正要》中关于莲藕功效的内容相似：“味甘，平，无毒。主补中，养神，益气，除百疾，消热渴，散血。”

④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 99.

⑤ 《迹象与生命》波斯文排印本中写作“کیتوخواه (kītū khvāh)”，应为汉语“鸡头花”之转写。经考证中国史书中并无被称为“鸡头花”的植物，《迹象与生命》中所记载的“鸡头花”准确的汉文名称应为“鸡头”或“鸡头果”，该植物因其果实形似“鸡头”故而得名，学名“芡实”。王祯所著的《农书》中记载：“芡，一名鸡头，一名雁头，山谷诗云：‘剖蚌煮鸿头’，是也。”

⑥ 指其生于淤泥之中。

⑦ 王祯《农书》中记载：“叶大如荷，皱而有刺。”宋代文人苏辙在《西湖二咏·食鸡头》中描述芡实带有青刺：“芡叶初生绉如谷，南风吹开轮脱毂。紫苞青刺攒猬毛，水面放花波底熟。”

⑧ 即红菜头。

⑨ 即“دنبلان (dunbalān)”，意为块菌。

⑩ 甜菜今俗称糖萝卜，是制糖重要来源之一。新波斯语中甜菜被称为“چغندر (chughundar)”，在中国古籍中被记载为“蓴达”“军达”等，均为甜菜在中古波斯语中“gwundar”的译音。芡实根肥大，与甜菜根类似，但芡实根“制成粉面食用”在中国史料中鲜有记载，一般作为药物服用或敷用。考虑到在伊朗地区人们将煮熟后的甜菜根称为“拉布 (labū)”，从古至今一直为民众喜爱的美食，或许在历史上有芡实根传入伊朗，因其近似甜菜根而被当地人煮熟后食用。又或许此处将“芡实根”与下文提到的芡实果实“鸡头米”混淆。

⑪ 芡实花谢之后，花瓣脱落，露出球形果实，其果又被称为鸡头米、鸡头果等。《中药大辞典》对鸡头米的记载为：“干燥种仁呈圆球形，直径约6毫米。一端呈白色，约占全体三分之一，有圆形凹陷，另一端为棕红色，约占全体三分之二。表面平滑，有花纹。质硬而脆，破开后，断面不平，色洁白，粉性。无臭，味淡。”鸡头果表皮坚硬，是江浙地区熬制腊八粥的食材之一，此外还可被磨制成面粉，用于膳食。食用鸡头米在中国各地历史悠久，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便记录了鸡头粉雀舌子、鸡头粉血粉、鸡头粉擀面、鸡头粉羹、鸡头粉馄饨等多种膳食，说明鸡头粉为元朝中国社会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食材。

⑫ 此处与中国古代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关于“种芡法”的记载相符：“八月中收取，擘破，取子，散着池中，自生也。”

⑬ 芡实消暑解渴之功效在清代医学家吴仪洛所著《本草从新》中有所记载：“(芡实)补脾固肾，助气涩精。治梦遗滑精，解暑热酒毒，疗带浊泄泻，小便不禁。”

三、《迹象与生命》所载中国药用植物 信息来源

1. 中国药用植物的选取

上述几种中国药用植物及《迹象与中国》“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中国植物，无论是木本植物还是草本植物，几乎全部为中国南方植物，尤其是福建地区盛产的植物，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在《迹象与生命》中专门讲解伊朗树木的“介绍树木性状”一章中已包含了诸如葡萄、苹果、石榴、杏、榛子、桑、枣、柳、杨、紫荆等伊朗与中国均有分布的树木，宋元时期中国种植的大麦、小麦、水稻与高粱也同为当时伊朗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大麦、小麦、黍米、水稻与高粱性状”一章中也专门有所介绍，上述这些植物无需在“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重复介绍。

此外，由于陆上交通不便且路途遥远，元朝的海外贸易以海路为主，杭州附近的澈浦港与庆元（宁波）港、福建境内的刺桐（泉州）与福州两港以及广州港等当时元朝主要的港口均位于中国南方，《马可波罗行纪》中对澈浦、福州、刺桐三个大港均有翔实的记录：

行在（杭州）城附近澈浦港

海洋距此^①有二十五哩，在一名澈浦城之附近。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②

福州

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此城建造不少船舶，以供航行此河之用。”（地学会法文本增订之文）此城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此城附近有刺桐港在海上，该河流至此港。“有不少印度船舶来此，亦有商人赴印度诸岛贸易。尚须为君等言者，此城近海上之刺桐港，印度船舶运载不少货物

赴此港者甚众。诸船离此港后，上溯前述之大河而至福州城。此城因此输入印度之贵重货物。”（地学会法文本增订之文）^③

刺桐（泉州）

离福州后，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则抵刺桐城……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④

对外贸易海港集中在中国南方，输往海外的中国植物类产品自然也多为南方物产，而拥有泉州、福州两大海港的福建地区是元朝海外贸易的中心，除了前文提到的输往大食地区的福建荔枝干，桂皮、胡椒、槟榔、葵叶、茶、芒果、檀香、红松、沉香、灵眼（银杏）、莲花、鸡头（芡实）、杨梅等其他福建知名特产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元朝出口海外的主要货物及异域商人获利丰厚的常购商品，并作为中国代表性植物被《迹象与生命》所收录。

2. 贸易商人的介绍

上文引用的《马可波罗行纪》段落中提到，中国海港停泊有大量的印度海船，印度商人把印度的珍珠宝石等特产运抵中国，再将中国的商品装满海船后，由东海、南海经爪哇运抵印度次大陆，之后中国与印度的物产再由印度或伊朗商人通过阿曼海运抵波斯湾进入伊朗地区，在销售与推荐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时，商人会向当地人介绍伊朗、印度与中国植物之间的异同。此外，文中记录的中国植物保存与运输方法等常识，也有可能是在购买商品时直接从具有丰富运输经验的商人口中了解。上述各种中国植物的信息由此传入伊朗内地，并被拉施特整理与记录在书中。在《迹象与生命》中，当某些中国植物在印度亦有分布，或与伊朗当地某些物种类似时，书中均会进行细致的类比。

① 指行在（杭州）城。

② 沙梅昂注，冯承均译：《马可波罗行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0页。

③ 同上，第323—340页。

④ 同上，第341页。

3. 参考中国农书

前文已述，拉施特在《珍宝书》中曾提到翻译过有关中国“树木”的著作，但经过笔者对相关文本的整理、阅读与编译，《迹象与生命》中关于中国植物的内容并非直接译自中国的农学、草本学或医药学著作，不过考虑到拉施特曾下令收集过大量的各学科汉文典籍，并存放于拉施特镇的图书馆，因此不排除拉施特在编写《迹象与生命》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农学、医药学著作，或获得了任职于拉施特镇内的中国农学家、植物学家或医药学家的讲解与指点。

元朝时《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与《农书》三部农业学著作流传甚广。《农桑辑要》“是元代主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主持编写的，具体的编写人是孟珙、张文谦、畅师文、苗好谦等人”^①，成书于1273年，内容以中国北方农作物及农业生产技术为主，与《生命与迹象》中出现的植物多为中国南方植物不符。《农桑衣食撮要》作者为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生卒年不详），该书完成于1314年，晚于《迹象与生命》被估测的成书年代，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其参考著作。《农书》作者为元朝农学家王桢（1271—1368），成书年代为1300年左右^②，较《迹象与生命》稍早，与《农桑辑要》相比，该书添加了许多中国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内容，并比较了南北农业生产的异同。虽然《迹象与生命》和《农书》并无完整对应的译文，但有多处内容相近相似的段落，如王桢《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蓴属·莲藕》中对莲藕介绍如下：

莲，荷实也；藕，荷根也。《尔雅》云：其实莲，其根藕。

莲子：八月、九月中收莲子坚黑者，于瓦上磨莲子头令薄，取脆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长二寸，使蒂头平重，磨处尖锐。泥干时，掷于池中，重头沉下，自然周正。皮薄易生，不时即出。其不磨者，皮既坚厚，

仓卒不能生也。

种藕法：春初掘藕根节头，着鱼池泥中种之，当年即有莲花。

莲子可磨为饭，轻身益气，令人强健。藕，止渴，散血，服食之不可缺者。^③

除莲藕外，王桢《农书》中还记录了芡实（鸡头）、荔枝、银杏（灵眼）、茶等多种在《迹象与生命》中亦有记载的植物，因此从成书时间及记载内容来看，王桢撰写的《农书》具有被《迹象与生命》借鉴与参考的可能。

《迹象与生命》中各中国植物词条使用基本一致的格式撰写，首先用波斯语转写该植物的汉语名称，之后讲述其分布地区与生长环境，接下来对植物的茎、叶、根、花、果、籽等形状逐一进行描述，对果实、果仁有利用价值的植物会介绍其保存方法与“保质期”，最后讲解其功效、用途与栽种方式，这与宋元时期中国农书的编纂模式有一定相似之处。

4. 亲自栽培

在《迹象与生命》“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之“莲花”篇中讲解了莲花栽种方法：

需要栽种时，将其根部栽于沼泽地之淤泥之中，其籽新鲜时，将其置于大的淤泥沟壑之中，生于沼泽。鄙人曾按此法栽种。^④

拉施特在此处明确提到自己曾亲自栽种了莲花，在“茶树”“灵眼树”“荔枝树”“鸡头花”等篇中，对这些中国植物的栽培方法也均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载，这说明在元代中国植物不仅作为商品进入了伊朗，而且其种子也被带到了那里，并被栽种在伊朗的土地之下。1318年拉施特受他人诬陷被处以极刑之后，拉施特镇也遭毁灭性破坏，这位深爱中国科技文化的伊儿汗王朝宰相亲手打造的“中国植物庄园”亦随之化为乌有。《迹象与生命》中有栽种记载的中国植物未能在伊朗大地持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乃中国与伊朗交往史上一大憾事。

（时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波斯语教研室）

①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

②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460页。

③ （元）王桢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23—224页。

④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Āthār va Ahyā*, pp. 98—99.

Key word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ran, mosque, Hangzhou Phoenix mosque

Sino-Iranian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Jia Lieying, Cao Le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worsening of COVID-19 has further accelerated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In the face of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regional turbulence, China and Iran, two ancient civilizations,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In order to further meet the challeng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both sides urgently need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equip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VID-19,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Iran, cooperation

A Study on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in *Āthār va Ahyā*

Shi Guang

Abstract: *Āthār va Ahyā*, edited by Rashīd ud-Dīn Faḡlullāh Hamidānī, a famous *Vazīr* (prime minister) during Ilkhanate dynasty, is a book of agronomy and botany in Persian. The “Indian and Chinese Tree” chapter includes dozens of woody plant originally from China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names of the plants, their distributions, characteristics, planting as well as their functions. Through reading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evant text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cal data and mainly studies the texts about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these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into Iran through the relevant texts in this book and other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Āthār va Ahyā*, China, Iran, medicinal plants

The History of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ran

Feng Yunshu, Tan Qilong, Song Xian

Abstract: Through the Silk Road, China and Iran have conducted rich medical and literary exchanges. This article principally discusses the treatment of smallpox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X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levant experiences recorded in the works of medicine. It analyz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f Kublai Khan on the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describes the exchang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a reading of *Ili Han's Treasure Book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ihui Yaofang*. The authors also review the medicines from Yuan Dadu Huihui hospital, and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on Uyghur medicine found during a visit to Uyghur hospitals in Xinjiang.

Key words: Iran, medical exchanges, *Ili Han's Treasure Book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ihui Yaofang*, Huihui Hospital of Medicine